

## 政府是否公开信息得由公民说了算

↓想获得政府信息没那么容易 东方早报 5月8日 作者 邓聿文

### [东早一评]

湖南省汝城县黄由俭、邓柏松等5市民状告县政府的案件,因被称为“政府信息公开不公开第一案”而受到舆论关注。5月4日,黄由俭等向县政府申请公开有关政府部门调查材料的要求遭到拒绝;5日,他们把县政府告上法庭。

《信息时报》5月7日)

从5月1日开始施行的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被誉为打造一个透明政府的法律保障。现在,该案将成为检验地方政府是否能有效落实《条例》的一块“试金石”。

目前,社会上90%以上的信息掌握在政府手中。由于多年形成的工作习惯,以及缺乏法律制约,许多地方的信息公开仍然停留在单方面的承诺阶段,甚至被当作政府对民众的某种恩赐。从理论上说,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的实施,将使信息公开由过去单方面的恩赐变成申请人的权利,从而对政府信息的封闭状况有很大改观;另一方面,公众也得以通过参与政府信息公开,对行政权力运作进行全过程监督和制约。但是,要把这种理论上的图景变成现实,真正使公民行使知情权,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,恐怕并不那么简单。这里面除了牵涉到目前我国非常粗放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方式,以及需要完善、修改《保密法》《档案法》《统计法》等相关法律

规外,最重要的就是《条例》本身不可能穷尽现实中“不公开为例外”的情况,从而使一些人有空子可钻。

在现实中,对政府信息什么能公开,什么不能公开,一直是个难以“界定”的问题。掌握信息的部门和单位对那些涉及自己利害关系的信息,完全可以借口“保密”和“安全”需要,不公开或者缩小公开的范围。因为这种对信息的自由裁量权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。对此,公众虽然可以通过《条例》规定的申诉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渠道寻求救济,上级主管部门和监察机关也会督查行政机关信息公开的实施情况,但是,鉴于事实上的甄别“保密”托词之难和公民寻求救济的成本之高,叫人很难乐观。

因此,要使地方和部门不打折扣地贯彻和执行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,有赖于对信息公开是否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,并在公民寻求司法救济时降低其救济成本。就此而言,黄由俭、邓柏松等5市民状告县政府的上述案件意义重大。不论判决结果如何,它都或多或少会使政府在信息公开过程中感受到社会外在的压力。

### [快报再评]

信息公开,期待看来是不低的。信息公开基于公民需要了解政府的工作情况。既然政府代表公民利益,公民就有权利了解政府机构在怎样工作。政府信息公开不是政府是否愿意的问题,而是公民是否需要的问题。公民需要政府公开信息,是因为公民既有责任监督政府依法活动,也有责任监督政府按照能够实现公民权利的方式去运转。

在信息公开的实施过程中自定法律之外的框框,夹塞私货,根本上讲,是没有能够按照现代政府的一般方式来理解政府与公民的关系,认为政府是一个天然成立的机构,并且高于公民,就不免有哪些可以公开哪些不可以公开的问题。如果政府有独立于公民的利益,信息的不公开甚至会成为基本的取向。信息公开,看起来是一个技术问题,实际上是一个原则问题。推进政府改革,要做的事情还多着呢。

## 官员们别小看了“人民的脸色”

↓为何会有铁道部部长调任发改委的传言 南京晨报 5月8日 作者 秦宁

6日上午,有网友在人民网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博客里留言。“听说刘部长要调到发改委了,能得到证实吗?”王勇平回复了该留言。明确否认铁道部部长调任发改委的传言。他在博客里写道:“这个信息毫无根据,请不要以讹传讹。”(新华网5月7日)

### [晨报一评]

当传言弥漫之际,积极回应才能平息传言,因此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及时回应,亦应受到人们激赏。但是值得追问的是,为何会有铁道部部长调任发改委的传言?

尽管济南铁路局局长、党委书记已被免职,随后,济南铁路局对与这次事故有直接关系的局运输处、调度所和淄博车务段的5名领导干部,也实行停职检查。但不少网民意犹未尽。

众所周知,1988年1月24日,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特快列车,发生事故,造成旅客及铁路职工死亡88人,重伤62人,轻伤140人。国务院接受原铁道部长丁关根引咎辞职的请求;1987年,大兴安岭火灾中林业部长杨钟被解职。后来,在举世哗然的重庆“井喷事故”后,中石油老总马富才也引咎辞职……

至于为何是铁道部部长调任国家发改委,也有例可循。国家环保总局原局长解振华,因松花江水污染事件而引咎辞职,后来也是调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。有这么多的例子在前,网上流传铁道部部长调任发改委的传言,实在再正常不过。

### [快报再评]

怎么知道铁道部就没有重视传言,没有探究传言为何会出现呢?如果没有重视传言,恐怕也不会有王勇平在博客里强调“这个信息毫无根据”。把铁路撞车后部长仍在原地任职与撤去济南铁路局局长、对5名直接责任人停职检查和阜阳查处防御不力责任人相提并论,也未必妥当。对直接责任人的查处,是基于法律、行政责任等方面的处理,我想没有人会认为铁路撞了车,部长就有什么直接责任。传言的出现,当然是有原因的,那是因为人们希望有人为如此重大的事故承担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。

从政治上说,管理国家事务的有关方面,应当表现出对民众情绪的照应,因为“人民高兴不高兴”,理论上很重要。从道德上说,人们希望官员具备自省和自责的品质,在重大伤亡发生以后,能够有愧疚之感。这便是转调传言的社会基础。是的,对于一个相当层级的官员来说,发生在下面的各种事情,很难有直接责任,但政治和道德上的责任却很难回避。

## 拜托专家们搞懂了汉语再去碰英语

↓昂贵的太阳与昂贵的行政成本 成都商报 5月8日 作者 李清

### [成商一评]

近日有网友在某论坛发帖,展示成都铁路局贵阳客运段错误百出的中英文对照标牌。在这些标牌中,警风被译成“police breeze”(警察的微风),投诉被译成“throws to tell(投掷了来告诉)”。其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,贵阳竟被译成“the expensive sun”(昂贵的太阳)。而客运段党办沈主任对记者称,当初这些标牌制作时,曾请教过外语方面的专家。

(成都商报 5月7日)

在正常情况下,只要有初中英语水平者都知道,至少中国的城市名称,不能逐字意译成英文,“贵阳”译为英文直接用拼音即可。

笔者绝对不相信,整个贵阳客运段,没一位初中以上英语水平的员工。要知道现在的铁路系统,每年都会新进不少大学生的。就算一些大学生的英语,是“哑巴英语”,也难整出“昂贵的太阳”来。现在出现这样的情况,几乎只有一种可能,那就是翻译这些标牌的人,都是初中以下水平,或者完全的英文“门外汉”。

铁路员工不都是大学生,不都是英文专业出身,是正常情况。可让笔者难以理解的是,为何翻译标牌这样的专业工作,要交给那些“白丁”们去做呢?几个标牌翻译得不专业,倒还不致带来多严重的后果。可贵阳客

运段能这样“人尽其才”,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把不学无术,或专业、能力完全不相符者,安排到司机、调度、财务等岗位,让管理混乱不堪,乃至弄出事故来?

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,事情曝光后,客运段领导还声称,制标牌时请教过外语专家。笔者很想知道,专家叫什么名字,在哪儿工作,客运段“请教”他们,给了多少报酬。如果提供不出这些信息,那领导就是在说谎。如果能够提供得出来,那他们找了“南郭先生”,让公款当了“冤大头”,也难脱失职的嫌疑。

社会上的公司这样,应该早就失去竞争力,离被淘汰不远了。“铁老大”如此,却毫发无损,因为它是垄断行业,缺乏有效机制避免行政成本的浪费。谁能告诉我,这样的情况还要持续多久,民众还要为垄断交多少学费?

### [快报再评]

“贵阳”翻译成英语,变成昂贵

的太阳,你说这不通,他说是意译。但“贵阳”之阳并非太阳之阳,而是指“山之南,水之北”。所以铁路局翻译中的毛病,根本上说,不是不通英语,而是不通汉语。“警风”变警察的微风,“投诉”变投掷了来告诉,都是如此。

大家都在指责铁路局。铁路局有毛病,这是不用说了。但不可以放过“专家”,一个专家,要搞出这样的“汉译英”,实在是不简单。英语很通而汉语不通的外语人才,其实是不不少的,不要出了问题总怪英语水平低,单词没有拼错,语法上没问题,就算是文通字顺了,但汉语呢,是不是知道了“警风”不是警察的微风,“投诉”不是投掷了来告诉,“贵阳”不是昂贵的太阳,就没问题了呢?

中国人不通英语,情有可原,中国人不通常用汉语,理无可恕。中国的教育能把人教成连汉语都不懂却可以搞翻译的地步,不简单。

## 是否被妖魔化看看事实就明白了

↓没有妖魔化只有监督与关注 潇湘晨报 5月8日 作者 周东飞

### [潇湘一评]

“就连卫生部的回应,也没有平息一些对阜阳有偏见的人的猜疑。直到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出来说话才真正平息这些质疑声。”阜阳市委宣传部负责同志说,这几年无论是阜阳的什么事,再小的事,总能被搞出大影响来,妖魔化阜阳成了某种“时髦”。“我们欢迎多元的声音,虚心接受正确的监督,对于这些我们不会悲观,但还请不要抹黑,不要妖魔化阜阳。”宋卫平说。

(法制日报 5月7日)

阜阳方面的心理感受可以理解,但是若要以简单的“妖魔化”三个字来自我辩护或者拒绝批评,恐怕没有多大说服力。媒体所坚守的原则是批露真相针砭时弊,有不正义之处便会有监督和批评,而不是先设定好一个地域,再去围攻和找茬。倘若某一地域被频频曝光,它应当首先反躬自问而不是以恶意揣度他人。

100多年前,美国杂志《麦克卢尔》刊发了记者林肯·斯蒂芬斯撰写的《明尼阿波利斯之差》,从此奏响了20世纪初美国黑幕揭发运动的序曲。明尼阿波利斯是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,在政治、社会等多个方面产生了混乱和腐败。斯蒂芬斯通过出生人死的细致调查,成就了黑幕揭发运动的开山之作。此后,他又将批评的矛头指向圣路易斯、匹兹堡、费城、

芝加哥和纽约等城市,于1904年集结出版了《城市之差》。正是这些集中火力对城市的批评,促进了美国市政管理的改革和官员的廉政建设。

我们的执政党不只一次地表明,要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,那么上个世纪之初的美国未必不能作为新世纪之初中国的镜子。

有足够的证据表明,中国的舆论监督正受到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。现在的问题是,这种重视能否体现于每一个个案。就舆论漩涡中的阜阳而言,若能从下意识的防范与反弹中校正方向,若能将媒体批评的事实看作“城市之差”,则其必能从纷扰焦虑走向一个城市应有的荣光。

### [快报再评]

“妖魔化”这个词引进汉语,原是用来揭露西方媒体对中国的选择性甚至歪曲性报道。现在看来,它已经

成了一个解释框架,对外揭露西方媒体的不公正实质,可用;对内表达“可恶新闻”的不满,也可用。

妖魔化还是不妖魔化,首先应该是事实是否存在。但是,惯于使用妖魔化这个词的人,首先想到的并非事实是否存在,而是想到是否被选择性地关注了。例如,你说我这里有腐败,但你那里也有腐败,别的地方也有腐败,为什么你要说我?于是要按照其不妖魔化的做法,就只好大家都不作声。

与妖魔化相对的,应是神圣化。吹捧歌颂搞到胡言乱语的程度,也不会有人反对的,最多被神圣化的人只会说一下“哪里哪里”,而笑意会一直流到心房,造神造圣的人也将受到重谢或者重赏。

你说我这里有不好的事,说得不对,那就是歪曲;说得对了,那就是妖魔化。妖魔化真是一个好理论,它使人永远不必面对事实,解决问题,而只需抨击舆论的批评。